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春去秋來，因SARS肆虐而推遲的各項活動，都擠在秋天舉行了。10月中旬，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四十周年、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，中心將主辦「思想史上的個人、社會與國家」研討會。本刊自創刊十三年來，各欄目發表不少重頭文章，引起學術文化界廣泛關注；而在「三邊互動」這個為讀者、作者和編者提供說「私房話」的最小的欄目中，各地讀者熱心地評點文章，提出建議和批評，也是對本刊的積極支持。

——編者

政治與審美之間

林國華的〈修西底德的回憶——初讀《波羅奔尼撒戰爭史》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03年6月號）重點剖析的「政治瘟疫」，就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制。正像非到生死關頭，個人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非政治性一樣，只有在戰爭的緊要關頭，這種政體的危機才全面暴露。人人有權等於人人無權，完全平等（至少在理論上）的眾人之上如果沒有一個駕馭者，則城邦就是

一片混亂。所以修西底德說：「雅典雖然在名義上是民主政體，但事實上，權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利克里手中的。」在此之前，導致雅典城邦繁榮的希波戰爭之所以勝利，原因就在於「偉大的」特米斯托克利的一句指示：雅典人的將來是在海上。可見，雅典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一兩個「偉人」。但酷愛民主的希臘人又不歡迎「偉人」，他們十分害怕偉大的事務。波羅奔尼撒戰爭以失敗告終，民主制才是古希臘的政治瘟疫，它最終葬送了雅典帝國。

古希臘人畢竟為許多時代的人所不及。柏拉圖曾說過：「從任何方面看，我們的（城邦的）整個政治體的創立就是對最高貴的和最好的生活的模仿，我們認為，它真的是最真實的悲劇。」希臘人害怕「偉大」，但他們從事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實驗：讓個人屈從於整體的權力，沒有個人權利，沒有私生活，沒有種種角落和瑣屑，城邦的一切事務都在廣場的光天朗日之下決定，這在見慣了私慾膨脹和陰謀政治的今人看來，不正是一種「偉大」麼？所以，柏拉圖說雅典政治

實踐是一出真正的悲劇，所以拜倫一往深情：你毀滅了，然而偉大！

政治上的瘟疫卻是審美上的偉大，這就是古希臘。黑格爾在討論希臘藝術時指出，古典時代的特點是個性與整體性的統一，也即個人與城邦的統一。這一特點使古希臘成為最適合藝術發展的「一般世界情況」。沒有人會懷疑古希臘藝術的偉大，而這一點，又與古希臘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有關。從而，我們既不能眩惑於古希臘的藝術而無條件地禮讚她的民主，也不能因其沒有現代人的自由而對她的藝術有任何輕薄之辭。分別使用政治與審美的不同視角，可能是我們閱讀古希臘的最好方式。

讀罷林文，我想到的另一個問題是，可能正是雅典文明具有永恆的藝術魅力，後世的極權主義者似乎從中悟到了政治審美化的妙處，大眾參與、人人當家作主、廣場集會、遠景藍圖、宏大儀式、偉大領袖等等，古希臘的政治瘟疫其實並未離現代人遠去。

單世聯 廣州

2003.8.29

與「名正言順」無關

王柯先生的〈「民族」：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03年6月號）一文，認為把日本作為鏡子，可以看到中國民族主義扭曲的面孔。

為甚麼王柯先生把日本當作鏡子，而不是西方？王柯先

生在文章中回答說的，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家關於民族主義的文章，幾乎無一例外都誕生於日本。我們知道，日本先於我們從英法德等先進國家吸收西方文化，當中國要走向現代化時，據近代先賢的觀察，最為接近中國的是日本和德國，尤其是日本，所以師從日本。所以鏈環關係應該是這樣的：英法—德國—日本—中國，那麼日本是這個鏈裏中國之前的最後一環。儘管中國與日本之間有着較為親密的文化親緣關係，按照王柯先生的觀察，中國學習日本，產生了變異，而在日本與德國之間，與英法之間，文化差異更大，日本學習德國，乃至英法，不會產生更大的差異嗎？

從中日之間「民族」的概念來區分，對於看清民族主義問題，我認為意義不大。這是受傳統中的「名正言順」的思想影響。概念實際上是不可定義的，也是不可辨析的。對「民族」概念進行區分和辨析，從來只會是導致混亂，沒有一次達成共識。

我認為比較好的參照系應該是英國。從表面看起來，英國好像沒有經歷過德國、日本和中國這樣的民族和國家之間、族民和公民之間的衝突，但實際上，在霍布斯那個時代哲人的思想裏，可以看出這些衝突是存在的。

王柯先生所說的中國民族主義扭曲的面孔，與其文章結尾提出多元主義對抗民族主義，這二者之間並沒有足夠的邏輯關係。中國民族主義扭曲

的面孔，只能說中國民族主義錯了，而無法質疑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。既然沒有辦法認為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也是扭曲的，那麼拿多元主義來轟擊民族主義，靶子到底是扭曲的中國民族主義，還是可能沒有被扭曲的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？

王柯先生的文章，不能排除隱含着這樣一個判斷，就是認為真正的民族主義必須移植自外來的文明，例如是日本。這更是危險得多的問題。

陳永苗 福州

2003.8.19

不能忽略鄉村社會自身的因素

貴刊8月號蕭唐鏢〈二十餘年來大陸的鄉村建設與治理：觀察與反思〉一文，對中國農村的問題作了整體研究，提出了總體的解決方案。在享受文章的氣勢和酣暢之餘，仍有一些疑問和思考，欲就教於作者和讀者。

第一，當我們立足於從整體上理解鄉村困境的成因時，立足鄉村自身的解釋是否就不需要了？如作者所說的農村嚴峻形勢，在各地的表現並不一樣，即使在中西部各省，也有很不同的面貌。比如時下成為熱點的農民抗爭，有的地方農民行動的主流可能是消極的撿荒和出走，有的地方則是組織化的反抗，而這些在蕭文中是一起列舉的，但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多不集中表現在一個地方。

第二，作者提出「如欲解決鄉村問題，就不能不『直搗黃龍』，謀求從體制安排及其

價值轉換上解決問題」。這已成為學術界很多人的共識。「直搗黃龍」說來容易，但現實是否有這樣運作的空間？這種立足在鄉村之外試圖「從根子上解決問題」的說法，可能恰恰忽略了鄉村之外更深更廣的國情。如果現存的忽視三農的利益和權力結構有其很難撼動的現實基礎，甚至某些部分有基於中國城鄉實際的合理性，那麼提出這樣的方案可能就會流於空想。

第三，對鄉村建設的關注和討論是好的，但是，太大程度上修改「鄉村建設」原有的含義仍不免讓人擔心。上個世紀20、30年代鄉村建設的首創者晏陽初、梁漱溟等是想發掘鄉村社會內力的建設鄉村派，如果我們對今天「三農」問題困境的宏觀背景有更為切實的理解，也應看到這種解決思路仍然有其重要的生命力，起碼有着極強的啟發性。如果把解決農村問題的所有努力都納入「鄉村建設」的旗下，可能並不利於問題的理解和解決。

當鄉村建設仍有立足鄉村自身的必要時，對鄉村本身的理解，無論對於那些致力於從鄉村外部解決鄉村問題的人，或是致力於從鄉村社會內部解決鄉村社會問題的人來說，都是不能迴避的主題。畢竟，在外部的重壓下，鄉村的反應也並不是如模子刻出的一樣那麼一致，而當我們帶着良好的願望，在鄉村推行啟發內力的鄉村建設時，也並不是總會見效。這時，起決定作用的解釋因素無疑是鄉村社會自身的因素。

全志輝 北京

2003.8.23